

緊抓北都機遇 提速發展AI產業



林健鋒

議事論事

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級別會議開幕式，發表題為《攜手構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體系》的主旨講話。國家元首親自出席大會，說明人工智能已上升至國家戰略的重中之重。習主席指出，全球人工智能技術創新進入前所未有的活躍期，要「讓人工智能賦能千行百業」。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智能經濟核心產業規模已超過萬億元人民幣。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亦在上海應運而生，成為人工智能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國家全力推進人工智能發展，香港一定要緊跟國家的步伐。特區政府已確立「AI產業化，產業AI化」的發展方針。北部都

會區正是承載這場變革的最佳平台。北部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數據科學、先進製造等重點領域。特區政府正全力推進洪水橋產業園、河套香港園區、新田科技城的建設，並推動沙嶺數據園算力基建提速。整個布局是要吸引整條創科產業鏈的高增值部分落戶香港。

開放中立法治的創科平台

洪水橋產業園公司近日已正式投入運作。令團隊最感鼓舞的是，目前已收到多份極具誠意的意向書，涵蓋本地、內地及海外企業。目前約八公頃「熟地」可即時使用，其餘15公頃將於明年底完成平整。目標是未來一年內落實首批簽約落地項目。北部首個片區開發試點的洪水橋項目，已收到兩份來自「有分量」企業的聯合財團標書，入標團隊均為地產發展商與

科技、產業企業聯合組成。這是極為正面的市場信號。產業園會透過公私營合作、與企業共同發展，建立可持續的營運模式。洪水橋產業園的定位清晰明確——善用完善交通網絡和鄰近深圳前海的位置優勢，推動高增值或智能化生產，例如製藥、食品加工，以及先進建造業等多元產業。

香港發展人工智能，有兩項得天獨厚的優勢。**第一是穩定的能源供應。**人工智能和數據中心是「吃電巨獸」，沒有可靠的電力，一切無從談起。香港的供電可靠度達99.999％。中電已制訂北都未來十年的供電方案，並持續提升北部都會區的輸配電基建。這種世界級的電力保障，確為城市之最。**第二是國際認受性。**香港擁有普通法體系、資訊自由流通、國際化營商環境，這些都是人工智能企業最看重的條

件。香港正正可以提供一個開放、中立、法治的創科平台。

「度身訂造」招才引資方案

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支持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早前來港考察調研，首站便是考察洪水橋。這清楚說明，北都不僅是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重中之重，更是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機會就在眼前，問題是我們夠不夠快。北都的產業用地約八百公頃，當中四成在未來五年陸續產出。洪水橋產業園成為這些重點產業的搖籃——高增值智能生產、製藥、食品加工、先進建造業，全部可以在這裏落地生根。招商引資不能一本通書睇到老。產業園會為企業提供最大彈性的「度身訂造」方案。產業園將提供

商業配對、設備租借、檢測認證及人才招聘及培訓等一站式高增值專業服務。並會與洪水橋大學城聯動發展，深度融合產學研。長遠目標是打造成亮眼香港品牌，協助內地企業「出海」及海外企業進入內地市場。

人工智能的浪潮不會等人。香港人最厲害的是靈活變通，但靈活之餘要夠快。常言道：「蘇州過後無艇搭」。國家已經為人工智能發展鋪好路、搭好台，香港必須提速提效，將北部都會區和洪水橋產業園打造成人工智能和先進製造業的集聚地；企業也應該「喝上頭啖湯」，精準捕捉香港未來經濟引擎的機遇。這既是對國家戰略的回應，也是對香港未來最實在的交代。

行政會議成員、洪水橋產業園公司董事局主席

警惕美西方歷史修正主義對二戰中國記憶的消解

李夏穎
夏穎泉

議
論
風
生

引言：記憶與話語權，二戰歷史正義的攻防戰

2026年是東京大審判80周年。近年來，二戰記憶在美西方政治與輿論體系中悄然發生修正主義轉向，不僅表現為對戰爭責任與正義譜系的重構，更體現為一種服務現實戰略利益的「修正記憶」，其核心在於以敘事操控塑造歷史合法性，以為美西方主導的地緣戰略擴張與價值輸出提供道義支撐。其主要表現途徑有三：一是以「普世價值」包裝的意識形態重構。在西方學術與政治話語中，二戰被描述為「自由民主對抗威權專制」，突出「美軍主導」「西方民主國家勝利」的簡化敘事，將中國與蘇聯（俄羅斯）排除在「勝利者的正當性」之外。二是弱化中國戰場，忽視中國的重要貢獻。中國從1931年起長期抗擊日本法西斯，但在美西方主流敘事中，中國戰場被視為「區域衝突」。三是由「淡化蘇聯貢獻」走向「抹黑蘇聯」。冷戰期間，美歐逐步將蘇聯從「二戰盟友」轉變為「意識形態敵人」，刻意淡化蘇聯在擊敗納粹德國中的決定性貢獻。近年更是出現了「蘇聯與納粹同負戰爭罪責」的歷史修正主義敘事。如2019年歐洲議會《關於歐洲歷史記憶重要性的決議》出現將蘇聯與納粹德國在二戰爆發中的責任並列的敘事。

事實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是中美蘇英同盟國共同抗戰的成果，中國與蘇聯分別在東方與西方戰場發揮了關鍵性作用。美西方歷史修正主義對二戰記憶的異化，不僅消解了人類文明反法西斯的共識，也動搖了戰後國際秩序的歷史正義基石。

一、消解二戰正義譜系，為美西方霸權奠基

1945年二戰即將結束之際，以中、美、蘇、英為核心的反法西斯同盟國在雅爾塔會議上共同規劃了戰後國際秩序的基本藍圖。隨後，該秩序以《聯合國憲章》為法理支柱，制度化確立了國家主權平等、反對侵略戰爭、集體安全機制等基本原則，

構成戰後國際關係的核心規範基礎。戰後國際秩序的建立，不僅源於戰時同盟國之間的戰略協調，更深植於中蘇等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付出的巨大犧牲與制度性貢獻。作為決定性戰勝國，中蘇理應在戰後秩序中擁有無可取代的歷史正當性與制度話語權。這一現實既是歷史的邏輯延續，更是國際法理的應有體現。

進入21世紀，尤其在俄烏衝突與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的背景下，美西方歷史修正主義敘事日益強化，試圖削弱中俄作為二戰戰勝國在戰後秩序中的法理地位，轉而以「自由民主陣營」一家獨大。在美西方主流教科書與政治話語中，蘇聯常被等同於納粹德國的極權政權，中國的十四年抗戰亦被邊緣化為美援主導的次級戰場。同時，西方智庫以「制度更新」為名推動聯合國安理會結構重構，主張削減否決權，倡議「民主聯盟安理會」，意在弱化戰勝國機制的合法性，推動以「民主共識」取代「戰勝國法理」。實質上，這是對雅爾塔體系的制度成果去中心化，體現了一種藉制度改革之名重塑國際規則、歪曲歷史正義的戰略霸權邏輯。

美西方這種歷史修正主義的意圖在於將「記憶主權」轉化為「霸權正當性」。通過有意淡化中俄作為戰後秩序締造者的歷史地位，美西方妄圖製造出一個「歷史空場」，以嵌入新的戰略敘事邏輯，進而將中俄塑造為「制度挑戰者」，自身則標榜為「自由與正義的捍衛者」。這種敘事將當代國際矛盾虛構為「民主對抗威權」的道義衝突，其邏輯基礎並非現實格局，而是對二戰記憶場域的前置改寫。在此話語體系中，戰後秩序正從「多邊共識」轉向「西方價值聯盟」，使美西方在全球軍事干預、外交孤立與經濟制裁中的行為獲得文化與歷史的合法性遮蔽。從俄烏衝突到台海危機，「價值觀同盟」已然成為西方敘事的核心話術，其實質在於重塑一部以「西方民主國家勝利」為核心的二戰史敘事，為美國主導的西方霸權披上「歷史正義」的外衣，以掩蓋其現實中的地緣擴張與制度排他性。

二、二戰記憶「去中國化」，遏制中國崛起

中國作為二戰東方主戰場，長期獨立堅持對日作戰，在牽制日本法西斯主力、延緩德意日法西斯全球戰略協同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之一。1943年《開羅宣言》明確將中國與美國、蘇聯、英國並列為「四大國」，確立其作為戰後國際秩序共同締造者的地位。中國軍民在十四年抗戰中頑強抵抗，對日本兵力形成有效鉗制，為盟軍戰略部署贏得了關鍵時間窗口和地緣緩衝空間。從制度構建與戰爭貢獻的雙重維度看，中國不僅是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勝利方，也是雅爾塔體系確立過程中具有實質性推動作用的歷史主體。

然而，在當代美西方主導的二戰國際記憶體系中，東方戰場尤其是中國戰區的戰略地位與重要歷史貢獻，長期被系統性邊緣化。美西方歷史修正主義敘事不斷淡化中國貢獻，構造出一個以歐洲戰場為主軸、太平洋戰場為美軍主導的「西方中心史觀」，將中國抗戰邊緣化為「區域性抵抗」或「受援者角色」。這種記憶機制不僅嚴重削弱了中國在戰後秩序構建中的歷史地位，也為美西方當今在國際輿論中限制中國話語權提供了歷史合法性偽裝。

美西方二戰記憶「去中國化」的首要機制就是「時空遮蔽」策略。西方主流教材普遍將二戰起點界定為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或1941年底日本襲擊珍珠港，忽略中國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的長期孤軍抗戰。美國部分教科書甚至將中國戰場歸類為「區域衝突」或「附屬戰線」。此外，西方敘事還通過「因果倒置」的方式重構戰爭勝負邏輯。主流輿論廣泛傳播「原子彈終結太平洋戰爭」的敘事，將美軍對廣島、長崎的核打擊塑造造成太平洋戰場勝利的決定性因素，刻意淡化中國長期牽制日軍主力的戰略意義。由此，中國被剝奪了最早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國家道義地位，並被排除出全球反法西斯戰爭的主戰場。這種處理不僅降低了中國對戰爭勝利的貢獻，也使得美西方二戰敘事天然佔據「戰爭主導者」的話語高位。

美西方這種歷史修正主義旨在將「去中國化」的二戰記憶，轉化為遏制中國崛起的輿論基礎。中國作為二戰戰勝國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其歷史地位本應為其在全球治理中的建設性角色提供正當性資源。然而，美西方通過「弱化抗戰—邊緣中國」的修正主義路徑，試圖在歷史層面削解中國的道義基礎與法理正當性。這種歷史重塑不僅在國際話語中削弱中國的制度性影響力，也為美西方「價值觀聯盟」對抗中國崛起提供歷史遮蔽。此外，這種偽史觀也在東亞輿論中助長「反中敘事」的蔓延，製造對中國戰勝國地位的「歷史迷霧」。例如，日本右翼政客持續質疑中國在二戰中的關鍵性作用。

歸根結底，二戰記憶「去中國化」的本質是美西方試圖在二戰記憶層面掩蓋中國崛起的歷史合法性支撐，解構中國在東亞秩序中的主導地位，從而在道義層面為美西方對華戰略圍堵提供正當性包裝，最終服務於美西方遏制中國崛起的戰略意圖。

三、為日本脫責，為「台獨」張目，為重返亞太造勢

美西方最具戰略操作性的歷史修正主義，便是對日本軍國主義戰爭責任的「系統鬆綁」，以及對「台灣」勢力的歷史話語支撐。這種修正主義具有明顯的「雙軌結構」：一方面為日本侵略戰爭「去罪化」，另一方面則通過「去中國化」話語為台灣問題製造「歷史例外」，為美國亞太戰略部署提供合法性包裝。

在日本問題上，美國在「印太戰略」背景下對右翼修史表現出容忍甚至默許態度。日本右翼政治力量持續通過教科書、紀念館、政治話語等手段重構戰爭敘事。例如，靖國神社將侵略戰爭美化為「亞洲解放」，弱化日本加害責任。安倍晉三等政要頻繁公然質疑東京審判的合法性，意圖通過否定戰後秩序的正當性，推進日本在地區安全格局中的「正常化」角色。美方則將日本重新定位為「自由秩序的守護者」，以強化日美軍事同盟，推動其在對華遏制中的前沿作用。

在台灣問題上，美西方則通過默許「台

灣史去中國化」敘述，為「台獨」勢力虛構歷史正當性。台灣內部通過課綱改革與紀念機制，逐步邊緣化中國抗戰記憶，弱化日據殖民的壓迫屬性，並否定戰後接收台灣的正當性，轉而強調「台灣主體性」與「戰後斷裂」。這種敘事與西方「台灣地位未定論」相呼應，意在削弱《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文件確立的歷史法理基礎，為「台獨」主張披上「歷史合法性」的外衣。

此外，美日在歷史記憶層面的共謀具有明確的戰略指向。美國主要智庫如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等將日本視為「價值觀盟友」，將台灣塑造成「民主前沿」，藉此構建一種新的亞太安全敘事框架。日本由此從戰爭責任國「轉化」為「印太穩定支柱」，而台灣則被敘述為「未竟國家」的歷史遺產。

本質上，這一系列歷史修正主義操作構成對戰後秩序的系統性解構。它不僅掩蓋了中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歷史地位，更是挑戰了以聯合國憲章、《開羅宣言》等為基礎的國際法架構。美西方借歷史記憶的「戰略漂白」，實質上是修正二戰記憶支撐印太戰略擴張，將現實亞太地緣政治目標包裝為「正義干預」。

結語：以史為鑒，堅守文明秩序根基

歷史不是權力的附庸，也不應成為政治的幻術。當記憶被剪裁、史實被篡改，人類就可能再度陷入混亂與災難。美西方當下推動的歷史修正主義，不僅顛覆史學規範，更是戰略意圖的延展，試圖通過「歷史修正」重構「世界權力地圖」。

今年是東京大審判80周年，二戰記憶之所以重要，正在於它不僅關乎過去，更關乎當下與未來。守住對戰爭正義的認知底線，捍衛聯合國體系確立的國際秩序，應是國際社會堅如磐石的文明基準。在美西方修正主義的裹挾面前，歷史學者的責任與良知是挺身而出，以文為鋒，以史為鑒，捍衛歷史真實，捍衛世界和平正義。

暨南大學文學學院歷史系博士生；暨南大學中央四部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主任

從上海老樓更新看香港城市改造的緊迫使命



有話要說

葉建明

城市是現代化的重要載體，而一座城市的溫度，往往藏在那些最不起眼的老舊街巷裏。

不久前，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考察時，走進黃浦區半淞園路街道市民新村。這個始建於1957年的居民區，351戶居民曾長年聚居在廚衛合用的不成套老房中。如今通過「抽戶+原拆原建」，300多戶居民陸續回搬，徹底告別了「拎馬桶」的日子。總書記指出，「一枝一葉總關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國事。

這番場景，於香港而言，是共鳴，更是一面鏡子。

市民新村的蝶變，走得並不容易。改造前，七八戶人家合用廚衛，洗澡只能拎桶水沖洗。這樣的日子居民們熬了幾十年。

2022年12月項目啟動，351戶居民情況千差萬別，設計稿改了20多稿。街道工作人員帶著厚本子扎進弄堂，記滿幾大本「民意賬本」，最終實現100％簽約。改造

後，家家戶戶有了獨立廚衛和陽台，面積不低於原來標準；所有樓宇加裝電梯、地下車庫、全齡活動場地、微景觀花園一應俱全。

以人為本的更新之路

市民新村是上海城市更新的縮影。上世紀90年代初，上海城鎮人均居住面積僅6.6平方米，住房成套率不足三分之一，「拎馬桶」是無數家庭的日常場景。經過30餘年接續奮鬥，上海歷史性完成成片舊改，1.4萬餘戶「拎馬桶」改造任務提前完成，全面告別這一歷史性的民生痛點，並計劃在2032年前完成所有不成套職工住宅改造。

上海的經驗證明：城市更新沒有捷徑，靠的是「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靠的是「久久為功」。即便條件再局促，只要下足「繡花功夫」，就能在「螺螄殼裏做道場」。

香港與上海都是中國最早開啟現代化建設的都會，都有大量老舊樓宇。但香港面臨的局面，遠比上海複雜，挑戰更嚴峻。

香港土地面積狹小，樓宇老化速率持續攀升。全港現有超1.3萬幢樓齡逾50年的舊樓，按現有存續趨勢推算，2043年將達2.43萬幢。更關鍵的是，香港底層的居住困境——從缺乏廚衛設施的劏房，到居住面積更加狹小的籠屋，不少人的居住現狀與「體面」二字相去甚遠。

正因如此，解決住房問題，讓市民有尊嚴地生活，一直被視為香港需要急切解決的「深層次問題」。中央高度關注，特區政府也在持續發力，特別是本屆政府，已將此作為施政的重中之重。

香港舊房改造的新思路，是在有限土地空間內，探索一條以人為本、可持續的城市更新之路。一方面，政府以修復與重建並行的策略應對市區老化，推行「樓宇更新大行動2.0」等預防性維修計劃，並透過市建局推出多項樓宇復修支援計劃。自2018年起，政府累計撥款190億港元推進樓宇復修。今年3月1日生效的《簡樸房條例》為分間單位出租引入規管制度，確保單位符合居住環境最低標準。政府採取了先

登記、後執法」策略，提供48個月過渡期，截至5月中旬已收到逾萬宗登記申請。

從更宏觀層面看，香港首個五年規劃諮詢文件強調要增加供應房屋，持續推進公營房屋發展——未來五年約19.6萬個單位，其中北部都會區超7萬個；有序取締劣質劏房；加速土地開發與舊區更新。這套「組合拳」，正逐步構建起從底線保障到品質提升的完整政策鏈條。

上海的經驗對香港最重要的啟示，不在一城一策的照搬，而在於方法論與價值觀的共振。

「久久為功」的戰略定力

城市更新不能只算經濟賬，更要算民生賬、長遠賬。上海改造中「民意賬本」和100％簽約率，說明精細化治理必須建立在深度傾聽之上。香港舊區業主老齡化嚴重、產權碎片化突出，唯有將溝通前置、利益釐清，才能化解矛盾，實現共贏。城市更新更要有「久久為功」的戰略定力。上海用30年解決了一個時代的居住欠賬，

香港從簡樸房的過渡期安排，到北都建設，都體現了這種耐心。

城市現代化的標誌，不只是摩天大樓和金融中心，更在於每一個市民能否享有體面的生活。改造老舊小區，就是讓每一個人都能跟上時代腳步。在香港，這意味着讓長者不用再爬樓梯回家，讓居室能放下孩童的書桌，讓籠屋、劏房成為歷史名詞。這不止是改善居住條件，更是讓每個港人共享城市發展的成果。

上海用30年證明：只要方向對了，就不怕路遠。香港雖有更複雜的困局，但只要拿出「螺螄殼裏做道場」的韌勁，拿出「把老百姓關切的事一件一件辦好」的決心，同樣可以讓更多港人告別落後的居住條件，跟上時代的腳步。

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國事。讓每一個人都能有尊嚴地居住、有希望地生活——這是上海正在做的事，也必將是香港不懈努力的方向。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